# 走進花蓮豐濱 尋訪原住民族傳統生態知識

文／楊建宏[1*]、徐霈馨[2]、董景生[2]、林彥伯[2]
圖／楊建宏

[1] 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
[2] 林業試驗所森林生態組
[*] 通訊作者（jhyang@tfri.gov.tw）

圖1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及港口部落之位置

原住民族在臺灣已生活數千年，世代與大自然互動，發展出一套獨特且永續的環境管理知識，那便是「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此知識並非靜態或一成不變，而是透過部落族人日常實踐與口耳相傳，持續變化的生存智慧。相較於強調量化和理性分析的科學生態知識，傳統生態知識更「全面」地看待大自然，同時強調情感與道德價值。因為面對自然資源及土地的態度不同，故原住民族更關心地方利益及需求，且著眼於資源的永續利用。面對當今氣候變遷與棲地退化等等的生態危機時，重新理解、借鏡傳統生態知識，或許能提供未來林業經營及自然保育另一個全新的視角。

傳統生態知識的形成，與部落周邊的自然資源密不可分，這不禁讓人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擁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在面對著物種組成相似的植群時，他們對民族植物的利用方式會有所差別嗎？

## 新社部落與港口部落

花蓮縣豐濱鄉沿著台11線公路由北往南行駛，短短20公里的路程中，能夠拜訪兩個歷史脈絡截然不同的原住民族（圖1）。首先是新社部落（pateRungan），居住於此的噶瑪蘭族人昔日因為大量漢人拓墾的壓力，而從蘭陽平原搭乘竹筏尋找新的居所。相傳祖先航經此處時，被岸邊盛開的臺灣百合（*Lilium*

*formosanum* A.Wallace）吸引，因此決定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家園。如今，這個擁有緊鄰太平洋水稻梯田的部落，不僅造就了獨特的地景，更是噶瑪蘭族傳承珍貴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場域。繼續往南來到港口部落（Makotaay），這裡居住著阿美族人，據說，他們是從綠島遷徙至此，在光緒年間經歷過慘烈清兵誘騙屠殺的「大港口事件」。儘管歷史上多次面臨外來政權與文化的衝擊，港口部落至今仍積極透過豐富的藝術創作與教育，展現出強韌的阿美族文化特性。

雖然新社部落和港口部落擁有各自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但由於空間上相距不遠促使兩部落多年來互動頻繁。此外，他們被同一片「低海拔次生闊葉林」所環繞，進而讓兩地族人在民族植物的選用上，存在了高度重疊的默契。透過實際走訪兩地，並與二十餘位部落耆老及在地族人的深度訪談，在噶瑪蘭族新社部落和阿美族港口部落分別彙整出165種及134種民族植物的傳統生態知識，並從中挑選出文化關鍵物種繪製成季節曆。經比對，兩部落所使用民族植物種類的整體相似度高達64.52%。不過，如果進一步將這些知識依據「使用類別」細分，就會發現不同類別間的相似程度存在著巨大的落差。首先，舉凡作為飲食、器物或編織等「生活類別」的植物，兩部落展現了極高的相似性（可達59.63%）；涉及祭典或象徵意義的「精神類別」，相似度便降至39.02%；令人意外的是，與農業、放牧和漁獵相關的「生產類別」，相似度竟是所有類別中最低的，僅有29.41%。為什麼於同一片植群中選用民族植物，在日常生活中會存在著高度相似性，但到了精神和生產層面反而出現如此大的差異呢？

## 日常生活的默契：植物的「客觀」特性

用於「生活類別」的植物有個共同點可以被觀察到，這些植物多半具備明顯的「客觀特性」：意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察覺並利用該植物的某種特質。以食物為例，能端上餐桌的民族植物其首要條件便是無毒且可以食用，像是土肉桂（*Cinnamomum osmophloeum* Kaneh.）葉片具有獨特的肉桂甜和辣味，因此兩個部落族人都有將其入菜或泡酒；而雀榕（*Ficus superba* var. *japonica* Miq.）枝幹上會結滿的鮮紅隱花果，味道甜美，而會被採取作為點心食用。同理製作樹皮布或背袋等紡織品的植物，需可從莖或葉中取得纖維。因此像山芙蓉（*Hibiscus taiwanensis* S.Y.Hu）、黃槿（*Hibiscus tiliaceus* L.）和青苧麻（*Boehmeria nivea* var. *tenacissima* (Roxb.) Miq.）等，兩個部落均會剝取樹皮經適當的捶打剝絲，取出細長且堅韌的纖維（圖2）。此外即便同屬生活類別，「居住空間」（如建材（圖3）、裝潢或圍籬）相關的民族植物相似度卻偏低（僅23.08%），主要是居家佈置的選擇擁有更多彈性。新社部落噶瑪蘭人偏好使用月橘（*Murraya paniculata* (L.) Jack）、林投（*Pandanus odorifer* (Forssk.) Kuntze）作為圍籬；港口部落則習慣

圖2　港口部落耆老示範從山芙蓉的樹皮剝取纖維

圖3　以民族植物之樹幹、枝葉搭建而成的傳統獵寮

使用水柳（*Salix warburgii* Seemen）和黃槿。縱使植物種類不盡相同，但這些民族植物仍都符合「生長迅速、枝葉繁茂、耐得住頻繁修剪」的客觀特性。

然而，當要應用到祭典或象徵意義等「精神類別」時，兩部落所使用的民族植物就會產生明顯的差異。因為這類植物的用途往往跳脫了物質層面的客觀性，轉而仰賴各部族世代相傳的信仰與深層文化情感。大葉山欖（*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對於噶瑪蘭族而言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意涵，大葉山欖樹大且強壯象徵著噶瑪蘭族的男性；花小而潔白如同噶瑪蘭族的女性。此外，此樹種子即使被海水浸泡過仍然能夠發芽，這象徵了噶瑪蘭族人堅忍不拔的性格，但這份濃厚的情感投射在港口部落的阿美族文化中卻未有任何相關紀錄。

然而，「客觀」特性並非原住民族使用「民族植物」的唯一考量。舉例來說，小米（*Setaria italica* (L.) P.Beauv.）是許多臺灣原住民族常吃的主食及祭品，對於港口部落阿美族人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民族植物，但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人卻完全不吃小米及其任何製品。根據耆老的口述歷史，祖先們常與太魯閣族發生衝突，而小米恰好是太魯閣族的主食。由此可知，在傳統生態知識的系統中，一段歷史記憶或族群情感，其影響力有可能凌駕於植物本身的客觀特性之上。

## 交織的部落日常：植物知識的互相借鏡

由於新社部落及港口部落比鄰而居，不僅促使兩部落間頻繁的自然活動，更讓食物、器物使用上的傳統生態知識產生了深度的交流。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耆老們不僅熟稔自身的知識，也時常能說出「鄰居」在民族植物上的用法，並以此對照自身文化的差異。以刺桐（*Erythrina variegata* L.）為例，每年春夏交替之際，綻紅的頂生總狀花序彷彿燃起的火把，這個顯明的自然現象，卻給予兩個部落完全不同的歲時信號。訪談時港口部落的耆老便提到：「噶瑪蘭族人才會用刺桐開花來看飛魚，我們不會。刺桐開花在我們這邊代表豐年祭要來了。」不僅如此，過去的文獻也指曾指出：「據說噶瑪蘭人教阿美族人一起去抓魚。」

時至今日，已經難以釐清每一筆民族植物知識的傳播路徑——究竟是新社部落傳往港口部落，還是反過來是從阿美族人啟發了噶瑪蘭族人？又或者，是傳統生態知識在兩族人間經過無數次的來回碰撞、修正，最終淬鍊出了極為相似的知識呢？但可以確信的是，這種跨越族裔的相互借鏡與學習，無疑是推升兩地民族植物使用相似度的一大關鍵。

## 現代化浪潮的衝擊：逐漸消失的「傳統」民族植物

面對現代化社會的便利性，傳統生態知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當工業化器具、塑膠製品或商業配方變得既廉價又唾手可得，過去許多在原住民族生活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傳統」民族植物，便無可避免地被迫退場。這種被現代化物品所替代的情形，出現在各個知識類別當中，但當中又以「生產類別」受到最嚴重的影響（圖4）。

生產類別涵蓋了農業、放牧與漁獵等能直接促進作物或肉類產出的民族植物。在訪談紀錄中，兩部落與農業及放牧相關的植物種類極其稀少，且雙方選用的物種完全沒有交集。實際走訪部落，很難在族人的田園中看見使用民族植物從事生產使用。傳統上港口部落阿美族人會以五節芒（*Miscanthus floridulus* (Labill.) Warb. *ex* K.Schum. & Lauterb.）的莖來搭建種植長豆的架子，如今大家會購買規格化的農用竹竿。在禽畜飼養上，雖然部分族人仍會採取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 Schumach.）或是雙花蟛蜞菊（*Wollastonia biflora* (L.) DC.）的嫩葉來餵養，但絕大多數家庭是購買市場販售的穀物或飼料。另一方面，在漁獵文化上出現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那就是儘管耆老依然能鉅細靡遺地描述如何利用民族植物的知識，但回到溪流與海岸，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與器具耐用度，現代工業製品往往成為首選。舉例來說，昔日必須仰賴手工將莿竹（*Bambusa stenostachya* Hack.）編織魚簍，如今多半已被鐵製魚籠所取代；過去需耗時抽取苧麻（*Boehmeria nivea* (L.) Gaudich.）搓揉編織成漁網，也早已被輕便且強韌的尼龍漁網全面替換。這種從「日常實踐」逐漸萎縮為單純「口述記憶」的困境，正是許多傳統民族植物正在面臨的危機。

圖4　新社部落以竹竿搭設棚架及其它農業生產使用之情形

## 結語

從長遠的歷史來看，傳統生態知識永遠都不是靜態，而是與時俱進的動態變化。無論是外來物種的入侵，還是不同政權對土地利用方針的干預，都促使著傳統生態知識不斷改變。回顧臺灣的歷史，歷代政權的治理政策，都在原住民族的植物利用的選擇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清末至日治時期，政府大力推廣水稻的栽植，直接導致了原住民族原本賴以為生的小米或陸稻逐漸勢微。又或者現今有耆老們會使用小花蔓澤蘭（*Mikania micrantha* Kunth）、南美豬屎豆（*Crotalaria trichotoma* Bojer）和昭和草（*Crassocephalum crepidioides* (Benth.) S.Moore）等外來種植物。

面對這些傳統生態知識的「轉變」，我們無須以「傳統流失」的悲觀視角來看待，因為這種知識的「轉變」不僅不是壞事，反而是原住民族的智慧在面對未知與多變環境時，展現出強大適應力與實踐力的最佳證明。只要傳統生態知識能夠持續被記錄與傳承，例如，將這些充滿文化意義的傳統生態知識轉化為「季節曆」，這份屬於花蓮豐濱鄉的土地記憶，就會跟著時間的流轉，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